

旅游研究 进展

保继刚 主编

(第9辑)

- 林敏慧：作为公共空间实践的群体性休闲及其地方建构研究
苏静：旅游推动下的民族社区空间变迁研究
黄力远：康复性景观视角下巴马养生旅游的游客体验
刘相军：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知识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影响
张蔼恒：主客交往视角下的旅游目的地跨国婚姻研究
陈柏桓：国际高星级酒店高管人才中国本土化研究

中山大学“985”二期专项基金资助

旅游研究进展

(第九辑)

保继刚 主编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游研究进展. 第9辑 / 保继刚主编.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017-8

I . ①旅… II . ①保… III . ①旅游—文集 IV .
① F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113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旅游研究进展

(第九辑)

保继刚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017-8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4

定价：45.00 元

主编的话（一）

中国的现代旅游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迄今刚好到而立之年。对一个学科而言，30 年的发展不算长，也不太短。但是当对这 30 年的研究做一个回顾的时候，我们发现，可以将这 30 年作一个粗略的划分，第一个 10 年是理想主义思潮主导，第二个 10 年是实用主义思潮主导，第三个 10 年是实用主义与理性回归的理想主义思潮混合主导。第一个 10 年的理想主义是“四人帮”倒台后，“科学的春天”到来，科技工作者被压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且将科学探索作为一项神圣的精神追求，只可惜这个 10 年是中国旅游研究的起步期，投入的力量少，对国外的研究也了解不多，刚刚出了一些好的成果，就被第二个 10 年的实用主义所取代；实用主义的时代，中国旅游研究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到了旅游开发的浪潮中去了，这个时期真正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最近的理想主义的回归是一次理性的回归，是一批有学术追求的研究者对研究的反思的结果。

什么是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讨论如何进行中国旅游研究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简单地说，研究是回答人类社会对自然、社会、文化、经济的未知，其目的是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强化人类对知识的了解，以使人类对某一方面的认知更清楚。因此，评价一项工作是否属于研究的唯一标准就在于该工作是否有新的发现，这是我们讨论中国旅游研究如何发展的一个基本点。在此，有必要对旅游规划、旅游研究、研究规范和学术贡献作一说明。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的需求较为旺盛，研究者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旅游规划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旅游规划和旅游研究在概念上容易产生混淆。

在规划实践中，规划师往往使用研究的结果对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提前做出安排和设计。规划是运用研究的成果，运用研究得到的规律和结论去预测和规划未来的发展。而旅游规划实践往往是发现问题、获得研究可进入性和研究经费的重要途径。多数情况下，正因为承担了地方的规划项目，所以才有机会及时发现问题、获得研究经费并与地方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后续的旅游调查研究中，可进入性较好。这就是目前国内规划和研究之间关系的表现。另外，就旅游研究者的职能而言，在承担规划任务的同时，他们必须善于发现新问题，进而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再将研究的结果运用到规划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的发展，即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公共任务和责任。

旅游研究与旅游规划概念混淆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点：第一，旅游研究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现实将生产实践和理论研究混在一起不加区分；第二，研究者以课题为导向，不重视学术问题和学术研究的规律；第三，科研资源严重依赖于旅游规划等实践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不足，学科独立性差；第四，将非学术性“规划报告”、“咨询报告”当作研究论文发表，低水平重复工作较多。

研究规范是在某一定时期、某一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从事同样研究的学者群体所形成的一种共识。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因此，最根本的研究规范要以保证创新为基础；学术规范的前提是学术独立。因此，真正的学术规范是在学术独立的传统中自发形成的。所以要以学术创新为目的和学术独立为前提来看学术规范。

中国旅游研究为什么到今天还有那么多缺少学术贡献的“论文”发表？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研究规范的约束。长期以来，我们的旅游研究不完全是以发现未知为目标，从各种学科转入旅游的研究者往往简单地将本学科形成的写作习惯移植过来，这种习惯慢慢就演变成了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的“学术规范”。

在知识创新基础上和学术独立前提下的研究规范应该包括研究过程规范、成果表达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以这样的标准衡量我们当代的旅游学术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多数旅游研究的规范是缺失的。这种缺失表现为旧“习惯”对知识创新的不适应，缺乏有效规范的指导必然混淆旅游规划和旅游研究的概念，使得研究过程、成果表达以及学术评价难以形成公认的标准，最终导致研究失范，使得中国的旅游研究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

怎样做才算有学术贡献呢？答案是，发现未知。因为回答了人类未知的东西你就对学术有贡献。尽管短期内很难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但科学史已证明，衡量学者最终的贡献，不取决于研究经费和发表成果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若干年以后大家公认的对知识和人类文化创新和积累的贡献。

出版《旅游研究》的目的在于鼓励创造，鼓励真正的学术贡献，这个想法得到了商务印书馆李平先生的支持。《旅游研究》计划每年推出1—2辑，每辑6—8篇文章，以系统深度的研究性论文为主。前几辑将重点刊登这几年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的博士论文纲要，之后将以约稿的方式编辑。

良好的研究氛围和研究规范的形成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万事只要开了头，就不难了。

保继刚

2008年6月于康乐园

主编的话（二）

某一年美国地理学会会长的主席演讲中讲到，地理学是什么？地理学家所做的事就是地理学。套用过来，旅游学是什么？旅游学者所做的事就是旅游学。

这是一个宽泛的说法。但某种程度的确适合后现代的观点，“所有的生活都是跨学科的”。在今天以流动为特征的社会中，学科边界也变得模糊，而旅游的魅力恰恰在于研究者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待和研究旅游现象的可能性。前段时间旅游学界五人对话中，谢彦君教授非常坚持建立起旅游学研究的核心和学科的可区分度与独立性。我理解谢彦君教授对学科的坚守，但我更偏向同意王宁教授的观点，为什么西方的学科界限不明显，是因为每一个学科的共同体之间的学术规范基本上是一致的。一旦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和基本的方法论普及开了，无所谓你是哪个学科的。

从旅游实践的角度，我认为旅游的核心是清晰的。首先，旅游的行业指向性强。从基础的操作性工作到上层的政策制定工作，旅游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的需求逐渐从奢侈的需要转为必需的日常需要。旅游经济从长期看都将是未来世界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持续的活力。最后，旅游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成为理解人的存在状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由此，旅游已经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个人“制度性的意义生产机制”(Graburn, 1989)，旅游行业和旅游现象所代表的生命力是旅游研究的最坚实基础。

从研究的角度，建立一个知识共同体的共同学术规范，不仅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规范，也不仅仅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和可进入性，更是一种学术价值和学术立场。这一点在建构旅游理论时尤为重要。

简单来说，理论就是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解释(Sharpley, 2011)。而任何的理论解释都隐含着某种学术立场。旅游理论也是如此，不同的旅游理论背后事实上反映了研究者的某种哲学或本体论立场。霍尔(Hall, 2000)曾将其归类为三种主要的哲学立场：

(1) 古典实证主义(Classical empiricism/ positivism)。古典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认为，真知的获得只能通过科学，也就是说，知识的基础是科学的研究和经验的证实。因此，实证主义研究的理论建立过程往往首先包括一个或多个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经验研究的证实，得以规律化和普遍化。

(2) 先验观念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这一学术立场主要追溯到康德的哲学

理论。康德哲学认为，对于事物的解释不是根据它们本来的样子，而是根据个人的体验。这种哲学立场因此与实证主义立场相对，强调任何事物没有唯一的或普遍的理论，而存在多种理论的可能性，这些理论反映了不同的个人在看待具体现象时所赋予的不同意义。这一立场与社会学中的现象学概念相似，主张知识与理论的创造来自于个体体验某一事物或现象后的理解，而这些理解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归纳或扎根方法的研究。

(3) 先验实在论 (Transcendental realism)。与先验观念论相对的是先验实在论，其主张是，现实就是它实际的样子。换言之，事物的现实是自有的 (given)，脱离于任何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和行动而存在。因此，在先验实在论立场看来，理论就是提出理解事物现实的概念框架。而对理论使用者而言，理论的检验就是看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内部一致性。

霍尔 (Hall) 总结的三种哲学立场在旅游研究中都存在，早期的旅游研究和知识创造主要以实证主义为主，近年来，先验观念论的哲学立场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纳，具体的方法从比如旅游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到旅游体验的纯现象学研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扩展了旅游研究的内容。

应该说，在许多与旅游相关的具体理论的创造和运用上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比如巴特勒 (Richard Butler) 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科恩 (Eric Cohen) 提出的旅游者类型划分，比如道尔西 (Doxey) 在研究主客关系时提出的愤怒指数理论，再比如麦肯耐尔 (MacCannell) 提出的舞台化真实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极大深化了我们对于旅游这一复杂现象的理解。下一步的挑战在于，通过旅游研究，我们是否能像其他成熟学科一样，建立起更加普遍适用的理论体系，提出能适用于其他学科的概念，使得旅游学成为知识溢出的学科？换句话说，国际上的旅游研究在“小”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而在普适的“大理论” (Grand Theory) 方面仍然还没有突破。

基于现状，我认为，中国的旅游研究仍然处在一个不断积累、广泛吸收的阶段。从哲学基础看，我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主要受唯物主义思潮影响，更多地认可实证主义，因此，早期进入旅游研究的地理学者因为受过比较好的实证主义训练，对中国旅游的贡献相对较大；从文化传统看，“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因此我们的研究以应用导向为主，甚至研究与应用不分，造成我们今天旅游理论研究贡献在世界上相对很小。

在中国旅游研究的问题认识上，最早我认为是研究规范问题，之后强调研究问题缺失和文化传统，现在看来除了这几方面问题外，哲学基础可能是我们更大的问题。

中国的旅游现象，出现的问题和可总结的经验，需要今天的旅游研究者既要有西方的理论基础，又要本土的扎实深入现象调查的能力，更重要的，还要有想象力。当现

实与已有的理论产生张力甚至冲突时，往往是新的理论和知识产生的机会。这个理论既包括已有的西方的旅游理论，也包括其他成熟学科的现有理论。

理论的建立是一个理性的和逻辑思考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我们对旅游现象和已有文献有充分地理解和消化，“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我们的旅游研究也是如此，或从文献阅读中，或从经验实践中，反复观察和思考，还原事实和现象本身，秉持一种基本的踏实做学问的学术态度和立场，这样的研究方可持续而有所建树。

保继刚

2013年12月于康乐园

主编导读

本辑包含了2014年到2016年完成的6篇博士论文辑要，涉及的研究议题较为广泛，博士生研究选题进一步分异与细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旅游研究，尤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代际转化。对于这批在21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青年学者，其正处于理想主义的理性回归之际，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术视野再次拓宽，研究规范和学术贡献日益受到重视。这批新生代的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西方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对西方理论的关注和运用拓展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研究的转型，使之能够更好地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对话。

本辑的6篇博士论文分别从社会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景观地理学、消费者行为学和人类学等视角选题，重点关注中国旅游大发展时期，在公共空间领域、民族旅游地社会空间、康复性景观、地方性知识、跨国婚姻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出现的典型现象。这些看似毫无关系的选题，实际上反映了旅游大发展时期，中国各个不同地方和生活领域对旅游影响的不同响应，由此产生一系列特殊的人地关系。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产生了丰富的图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话题。当前，休闲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空间最活跃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活动。许多休闲活动和休闲空间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为什么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休闲在中国城市如此受欢迎？为什么中西方民众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以及对参与社会生活的态度有着如此大的差异？林敏慧的《作为公共空间实践的群体性休闲及其地方建构研究——以广州为例》将研究聚焦在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休闲活动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从地方建构的视角出发，重点回答群体性休闲人群是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实践的，以及他们通过空间实践建构了什么样的地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旅游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民族社区社会空间的变化。民族村寨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正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新型旅游目的地。然而，随着旅游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苏静的《旅游推动下的民族社区空间变迁研究——以岜沙苗寨为例》聚焦于“民族村寨本是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景观作为其核心的旅游吸引力，为什么在旅游发展之后，其文化传统和景观会发生改变”这一现实问题，通过对岜沙苗寨的深入调研，研究旅游活动通过怎样的社会过程与民族村寨这一社区形式相互联系，并对民族村寨产生独特社会影响，尝

试为理解和解决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作出一定的贡献。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生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健康意识越来越成为生活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促进了中国养生旅游的产生和快速发展。由于养生是一个关于身体的现象，由知觉和感受的体验构成。一个人对身体状况的认知，特别是心理和思想上是否达到了最佳状态，是一种感觉和体验。在养生旅游中，游客由于健康动机旅行到养生目的地，并在该地获得了较好的康复体验，这个体验过程就像一个黑匣子一样，是未知的、有待发掘的。黄力远的《康复性景观视角下巴马养生旅游的游客体验》基于康复性景观视角，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为大背景、广西巴马为案例，探讨中国养生旅游活动中的养生游客体验，运用康复性景观理论来解释游客在具有康复性的地方的康复过程，为养生旅游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为中国养生旅游业的目标市场定位、目标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旅游发展成为民族地区主导生计方式以后，旅游业可能对当地自然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交界处的梅里雪山（当地藏族人尊称为“卡瓦格博”），号称“藏区八大神山之首”。每年秋末冬初，大批滇、川、藏、甘、青乃至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的藏民均来此朝拜，场面蔚为壮观。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登山热潮，到1998年因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实施，德钦县的商业性木材砍伐被全面停止，当地政府进而提出“将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旅游业发展逐渐影响到“神山”的保护。在利用这座“神山”开发旅游之后，当地藏民依然坚持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将其运用于旅游参与之中，对自然保护起到了根本作用。刘相军的《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知识对自然保护的影响——以卡瓦格博区域藏族村寨为例》将揭开藏民的地方性知识对自然保护构建的机制和影响，为同类型旅游地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旅游社会影响是旅游研究中重要的一环，但以旅游目的地婚恋作为对象的研究依然匮乏。在中国桂林阳朔，跨国婚姻现象具有研究的典型性。阳朔是一个人口仅30万的西部小县城，既非国际文化交流重镇也非处于边境沿线，但其跨国婚姻的数量远比相仿规模的县城高。阳朔的跨国婚姻现象一直吸引着大众的关注，不仅被阳朔本地居民所津津乐道，同时也因报刊杂志和其他媒体报道而广泛流传。从学术的角度，张蔼恒的《主客交往视角下的旅游目的地跨国婚姻研究——以阳朔为例》在流动的背景下考察旅游目的地东道主和游客间产生的深度交往行为，研究跨国婚姻在目的地产生的原因、过程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该研究系统地揭示了阳朔主客深度交往的内部动力、阳朔作为旅游目的地对跨国婚姻形成的外部力量、跨文化主客交往的演变过程和跨国婚姻家庭在阳朔的生活情景。

2010 年开始，中国酒店业进入扩张性发展阶段，酒店特别是高星级酒店的投资兴建加速，国际高星级酒店品牌纷纷进入中国。随着国际品牌酒店数量的不断增多，高星级酒店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国际高端品牌五星级酒店高管一般为 8 到 9 人，一般品牌五星级酒店为 4 到 5 人，中国五星级酒店的高管需求量已接近 5000 人，国际外派人员已经无法满足酒店业的需求，人才的本土化成为许多高星级国际酒店品牌的重要战略。美籍华人陈柏桓是凯悦酒店集团区域副总裁，一直致力于推动酒店管理人才的中国本土化，在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完成了《国际高星级酒店高管人才中国本土化研究》，重点剖析了国际酒店品牌的高层管理人才中国本土化战略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对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营运与发展以及东道主国家本土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辑由梁增贤副教授协助编辑。

目 录

作为公共空间实践的群体性休闲及其地方建构研究

——以广州为例	林敏慧	(1)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
二、研究进展		(3)
三、研究设计		(8)
四、研究介绍		(13)
五、结论与讨论		(34)
参考文献		(39)

旅游推动下的民族社区空间变迁研究

——以岜沙苗寨为例	苏 静	(41)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41)
二、分析框架及论文总体结构		(47)
三、旅游发展之前岜沙传统空间的生产及其特征		(50)
四、旅游发展后多元规则并存下的岜沙空间生产		(60)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69)
参考文献		(72)

康复性景观视角下巴马养生旅游的游客体验

黄力远	(74)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74)
二、研究进展		(79)
三、研究设计		(82)
四、研究介绍		(85)
五、结论与讨论		(96)

参考文献	(99)
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知识对自然环境保护的影响	
——以卡瓦格博区域藏族村寨为例	刘相军 (103)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03)
二、研究进展	(109)
三、研究设计	(114)
四、研究介绍	(121)
五、结论与讨论	(134)
参考文献	(136)
主客交往视角下的旅游目的地跨国婚姻研究	
——以阳朔为例	张蔼恒 (140)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40)
二、研究问题界定及研究意义	(141)
三、研究进展	(143)
四、研究设计	(148)
五、研究介绍	(153)
六、结论与讨论	(169)
参考文献	(171)
国际高星级酒店高管人才中国本土化研究	
陈柏桓 (175)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175)
二、研究进展	(178)
三、研究设计	(184)
四、研究发现	(188)
五、结论与讨论	(202)
参考文献	(206)

作为公共空间实践的群体性休闲及其地方建构研究——以广州为例

林敏慧^①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一) 选题背景

1. 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丰富图景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一方面脱离了原来僵化封闭的空间形态，为多样化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空间中的“墙”又以“门禁社区”的形式使得城市公共空间呈现碎片化。而作为“舶来物”的城市公园和广场，一方面优化了城市的物理环境，为市民休闲提供了有益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规划设计又没有摆脱“物质决定论”和“政绩工程”的色彩，与中国传统的休闲文化和城市肌理显得格格不入。在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多样化的图景之下，探索活动在其中的人们有什么样的需求，以及他们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是如何将公共空间建构成为适合他们活动的场所的这一课题，对于建设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特色、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显得意义重大。

2. 当前中国城市公共休闲的复兴

公共空间中的日常休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的典型性景观之一。公共休闲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普通民众的休闲得到了发展。其次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城市休闲生活时代的开启。在快速城市

^① 林敏慧（1982~），女，广东潮州人，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城市公共休闲方面的研究。

化背景之下，城市人的休闲生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公共空间中的休闲活动由于避免了商业化所带来的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大批城市中的草根阶层的日常投入与参与。最后，公共休闲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契合了国家“全民健身”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因此公共休闲又进一步得到了鼓励和发展，从城市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广场和城市公园的火爆场面都可以感受到公共休闲的活力。

3. 当公共空间遇到公共休闲：如何解读中国现象

休闲活动成为了中国公共空间最活跃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因为休闲活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大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显得生机勃勃。为什么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休闲，例如广场舞休闲会在当前的中国城市中如此受欢迎？为什么与西方的都市性有着诸多共同之处的中国当代城市，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以及人们对参与社会生活的态度却有着如此大的差异？公共空间的群体性休闲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现象，使得我们很难从基于西方语境的公共空间及休闲的理论中得到全面的启示。

因此，在中国语境下从微观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公共休闲对于中国大城市中的一些群体来说显得如此重要，更具体地说如何认识公共空间对于休闲者的意义以及他们具体是如何使用公共空间的，是摆在学者面前的紧迫问题。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1. 研究问题

本文将把研究聚焦在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休闲，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这种中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群体性休闲人群是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实践的？他们进行公共空间实践的意义是什么？为了更好地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以下将每个核心问题拆分成具体的几个子问题：

（1）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群体性休闲活动？

子问题：

- ①群体性休闲人群的休闲动机是什么？
- ②其休闲动机产生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 ③为什么他们要集体开展活动并且选择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进行？

（2）群体性休闲人群是如何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实践的？

子问题：

- ①休闲人群是如何使用公共空间的？他们是如何通过实践来生产和传达空间的社会和文化意义的？

- ②作为一种具身的活动，在空间实践过程中休闲者的身体是怎样与地方连结的？

③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活动，休闲人群建构了怎样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又是如何作用于地方的？

（3）群体性休闲人群进行公共空间实践的意义是什么？

子问题：

①休闲人群通过空间实践建构了怎样的地方？

②地方的建构与他们的休闲需求呈现怎样的关系？

③这些地方的建构能够给公共空间带来什么新的意义？

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理论上，本研究试图与已有的公共空间研究和日常休闲研究进行对话，弥补知识体系中的某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群体性休闲，研究的场域是中国的公共空间，为西方休闲研究增添了一个全新的休闲活动类型，有助于进一步打破以西方休闲者和公共空间作为研究焦点的垄断。其次，从空间实践的视角来探寻休闲人群在微空间的地方建构过程，有利于自下而上地更好地理解休闲人群是如何使用公共空间的，在空间中是如何互动的，是如何赋予公共空间特殊意义的，比以往客位地研究休闲者行为规律或者公共游憩空间的物质性规划更具人文关怀，并且展示了一个动态的、丰富的空间实践过程。

在现实中，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性休闲在近几年来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大部分人对其的了解仅来自于浅层的感知以及媒体的报道，甚至有部分人还因为“广场舞”被妖魔化而对群体性休闲有了一种扭曲的认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地去了解这些休闲人群到底为什么这么热衷于从事这样的活动、他们是如何开展活动的、为什么他们开展这些活动会引发如此大的冲突。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和建设，只有深切地了解了活动于其中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空间，喜欢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才能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的场所，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给当前以空间规划为主导的城市规划带来反思以及一点启示。

二、研究进展

（一）公共空间的经典性研究：作为政治表达和社会交往的空间

1. 公共空间：作为政治表达的平台

西方公共空间的意义缘起于古希腊城邦的公共领域概念，这里的公共领域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为了实现“公共性”所展开的政治讨论、公共舆论等的价值内容（Jurgen, 2004; Hannah, 2009），另外一个是实现这种政治价值的物理载体，也就是实体的空间（宋立新、周春山, 2010）。可见，公共领域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公平地参与政治表达的平台。在这样的视角之下，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是相似的，甚至可以互换或者合并。

2. 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交往的场所

除了作为政治表达的平台之外，在城市规划学和城市社会学中，公共空间通常是一个具有“公共产权”的城市的物理空间，在这里陌生人可以自由出入，可以在这里偶遇、交谈和集聚，在这里，公共空间就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Zukin, 1995; Jacobs, 2005; Watson, 2006）。正如奥鲁姆和尼尔（Orum and Neal, 2010）所指出的，公共空间的社会生活对一个城市的市民秩序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中的社会生活能够促进社会互动和建立社区凝聚力。

3. 基于经典范式的研究：公共空间的衰落

基于以上的两种研究范式，以森尼特（Sennet, 1992）为代表的一批国外学者以批判的视角对当代城市的公共空间进行了审视，他们认为当代西方的“公共空间”已经“衰落”，这类负面的评价研究在西方文献里被称为“失落之批判”（critique of loss）。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公共领域的失落、公共空间的私有化以及公共空间的社会排斥（Mitchell, 2005; 陈竹、叶珉, 2009）。

森尼特（Sennett, 1992）总结了公共空间衰落的原因，认为 19 和 20 世纪“私人的社会愿景”的上升使得公共领域被个体的自我关注所侵蚀，因而人们从公共生活转向了对个体的关注，这不利于社会的多样性。另外，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方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得公共空间自然而然成为了地方政府进行经营的对象，在这种逻辑下，城市公共空间成为提升城市形象以及吸引外部投资的工具而非社会交往的场所（Harvey, 2007）。

（二）另一种研究视角：公共空间的实践

1. 公共空间的实践

前文关于公共空间的经典性研究都有着长时间的积累和验证，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民主市民社会和社会公正的视角来观察当前的公共生活。但是以上研究更多的是一种“二元论”。钱俊希（Qian, 2013）认为经典的公共空间研究往往把空间划分为包容和排斥，在场和不在场，并且认为包容的以及在场的公共空间才是一个进步的空间。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情况却很难对应到这种二元论的任何一端中。包容和排斥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完全分离的两个面，他们其实是相互渗透的。如果遵循上述范式来研究公共空间，那么